

在怪物世為死者代言： 後疫情時代的動物倫理再思

黃宗慧*

現今普遍用「人類世」(Anthropocene)一詞來指稱全新世之後的地質時期，以凸顯「智人成為一股地質霸權，主導歷經漫長發展的地球」此現象(西蒙·路易斯，馬克·馬斯林 14)，但學者哈洛威(Donna Haraway) 2016 年的著作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卻刻意拒絕這個既自大又充滿末世感的詞彙——人類世一詞彷彿認為人類的毀滅力量無遠弗屆、因此地球已經「玩完了」——而以怪物世(Chthulucene)取而代之。乍看之下，怪物世所揭露的依然是人類對地球的巨大破壞：在環境被破壞後，為生存而演化的物種，因此猶如擁有怪物的樣貌。但如同環境哲學家范道倫(Thom van Dooren)所指出的，怪物世其實有著哈洛威所賦予的另一層含義，用以描述對於未來各種生物「更活得下去的世界」的想望(Dooren 2018: 92; Haraway 98)。在范道倫看來，哈洛威對怪物世一詞的使用之所以既指涉「早已是如此」的、地球毀壞的現狀，又指向一個具有希望的未來，是因為在正視滅絕的同時，她也期待不論是人類或其他形式的生命，仍能找到和地球一起存續下去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透過對怪物世的描繪，她正在提出一項倫理要求(ethical demand)：假設我們毀滅了世界，地表的其他生物還是可能如同多觸鬚的怪物般發展出和其他生命體連結與共生的可能性，還是能「以不同的樣貌忍受著，儘管也許並非毫髮無傷」。而正因這些不同的生命形式要一直存續下去絕非易事，我們於是有責任要為這個相當脆弱、但仍屬可能的未來而努力(Dooren 2018: 92)。至於努力的方式是什麼？很弔詭地，擔負起「死者代言人」的責任是其中之一，換個說法，就是「將他們帶回當下」，以關於死者的故事，來持續對他們的記憶與哀悼(Haraway 69)。¹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¹ 在此哈洛威挪用了卡特(Orson Scott Card)的小說《死者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的情節，將蒐集與訴說亡者的故事，視為一種對已經不在的生命負起責任、也為未來創造更多可能生機的方式(69, 101)。

哈洛威在書中引用了一則網路漫畫，來述說「哀悼」的意義。在該則預言式的漫畫中，一個小人兒指著開了花的蜂蘭，對另一個小人兒解釋，這種蘭的花朵像雌蜂一樣，能欺騙雄蜂幫忙授粉，但現在，蜂蘭精心擬態的蜜蜂早已滅絕，沒了蜜蜂作為幫手，蜂蘭只能用自花授粉這一招，來延緩最終仍在所難逃的滅絕：「關於蜜蜂的一切，什麼也沒有留下來，但我們從蜂蘭的花瓣形狀，知道牠曾經存在。蜂蘭這植物，詮釋了雄蜂眼裡雌蜂的樣子。」擬態的蜂蘭，在漫畫裡正扮演著「為死者代言」的角色——「即將滅絕的花所展演出來的這幅畫，成為我們對蜜蜂的僅存記憶」。如果漫畫在此結束，那麼確實只能傳達濃濃的末世感，但聆聽解釋的小人兒回頭了，在蜂蘭旁邊駐足，說道：「蘭花，我會記得你的蜜蜂，我會記得你。」(Haraway 70)承諾會在蜂蘭消失之後代牠記住蜜蜂、同時也記住蜂蘭，成為兩者的「代言人」，這讓故事的悲傷氛圍之中多了一點力量，因為當我們面對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他者時，如果願意記得牠們曾經存在過，會哀悼牠們的滅絕，或許就不會繼續理所當然地傷害更多生物。這種「記憶的藝術」(arts of memory)對哈洛威來說足以澤披所有的生物，也是復甦的生機之所在(69)，因此成為她所彰顯的一個重點。而讓她了解到哀悼重要性的關鍵人物，正是前述指出哈洛威怪物世一詞倫理意義的范道倫(Haraway 101)。

范道倫之所以強調哀悼的重要，和他有意反駁 TED 講者布蘭德(Stewart Brand)的說法有關。布蘭德在 2013 年的演講中，提出種種以科技來讓已滅絕的物種復活的可能，認為「反滅絕」(de-extinction)既然有望，人類實無須哀傷。在這場演講中，布蘭德先是舉例說明哪些物種如今已經消失，但隨即表示，儘管我們可能會「沉重、憤怒、悲傷。但別悲傷」，因為利用博物館標本或是 20 萬年前化石中的 DNA，很可能可以讓這些物種復活。²范道倫不認同這種「別悲傷」的態度，反其道而行地主張，我們需要懂得哀悼(Dooren & Rose 375-76)。一方面，他認為即使這些技術真的成功，人類也並沒有準備好和「復活」的動物共處(Dooren & Rose 376-77)；另一方面，對范道倫來說，更重要的事，是去了解過去的滅絕如何與為何發生，以預防更多的滅絕在未來繼續出現，而非將希望放在科學帶來的「樂觀」願景上。也因此，他認為對於身為大滅絕主犯的人類來說，哀悼才是好好面對我們欠下的滅絕債(extinction debt)(Dooren 2015: 11)、對已逝的生命負責的方式，也才會讓我們在歷經失落之後，以一種對生命更有責任感與使命感的態度，試著重新打造和他者的關係(Dooren & Rose 376)。

² 請參見 TED 影片《終止滅絕的明天。你準備好了嗎？》，https://www.ted.com/talks/stewart_brand_the_dawn_of_de_extinction_are_you_ready?language=zh-tw

之所以要透過哈洛威與范道倫的論著來介紹「哀悼」的概念，是因為時間軸拉到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一年多尚未平歇的此刻，全球累計的死亡數字依然在攀升中，這讓哀悼這件事對人類來說變得更近身。為疫情席捲下的死者代言，豈不正是眼前最重要的倫理責任，如果我們還想實現哈洛威所謂的「更活得下去的世界」？但現況同時也如哈洛威所引述的，安清（Anna Tsing）在《末日松茸》中所言——即使地球被人類嚴重破壞，地表的其他生物還是會在廢墟之中存活下來（qtd. in Haraway 37）；那麼比起述說哀傷的故事，難道不是「生命自有其出路」這類的消息更能讓人相信，現在做出改變，還來得及？例如今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甫推出的紀錄片《這一年，地球變得不一樣》（*The Year Earth Changed*），影片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疫情這一年，反而讓「動物以空前絕後的方式走向繁榮」；這樣的訊息，似乎才更能鼓舞人心？這部影片「以實際數據搭配意想不到的珍貴畫面，見證『少了人類干擾』的自然環境，各種動物如何尋回本該擁有的生活樣貌」，於是我們確實看到了「令人振奮的變化」。³ 影片中所列舉的，因為少了人類打擾而提升存活率的例證，包括赤蠵龜、座頭鯨、獵豹、黑腳企鵝等，連疫情之初因沒有觀光客餵食仙貝而受飢的奈良鹿，影片中也呈現了牠們如何找到了出路：年長的鹿帶領鹿群來到牠們記憶中曾經覓食的空地吃草，因此吃得更健康。⁴ 影片所凸顯的，人類的侵擾對於自然造成多大的破壞，確實足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人與環境、動物，如何能往更和諧共生的方向發展。

然而生命自能在廢墟中存活下來，並不意味著人類不需要再背負「滅絕債」；更何況，影片結束前其實有一則不能忽略的重要提醒：「封鎖帶來的影響不是永久性的。」因此，「我們能藉此獲得什麼樣的啟示，來找到更好的方式與大自然共處？」才是關鍵。很明顯的，如果人類沒能體會到，這些「生之敘事」的另一面正是要告訴我們，先前人類的活動曾如何妨礙動物的生機、造成大量的死亡，那麼疫情之後的世界，依然很難成為一個「更活得下去的世界」。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後疫情時代思考動物倫理時，以哀悼、述說來記憶死者，依然應被視為刻不容緩的工作。同時，儘管如紀錄片所顯示的，有些動物存活得比先前更好，但直接因為新冠疫情而失去生命的動物也相當多，而這些死亡，必須被記得與述說。

³ Stephanie Chiu (2021 年 4 月 22 日)。「沒人餵仙貝，奈良小鹿吃得更好？紀錄片《這一年，地球變得不一樣》跳脫人類的自以為是，揭露疫情之下動人的生態復甦」，Shopping Design, https://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6548?fbclid=IwAR3c2X1u8cWMC92UMKyDjTYOTC0q-0jo0B_zaomuJvCOcv7TpWHXTI0aNKY

⁴ 正文的相關內容均取自《這一年，地球變得不一樣》，https://tv.apple.com/movie/umc.cmc.3fob3t7nfhehpb3ilgynzxmnu?at=1010IGbf&ct=atvp_yearearthchanged_gen_gen&itscg=80101&itsct=atvp_yearearthchanged_gen_gen

但實情是，疫情以來關於動物的死亡敘事，並不多見。頂多，我們偶而能在諸多疫情相關的新聞中，瞥見一些關於動物處境的報導，例如與人類（娛樂）生活相關的，動物園如何不堪長期停業虧損而經營困難的消息：「有些不敵疫情壓力已宣布倒閉……至於許多較小型或是私人的動物園，原先動物照顧的品質已然堪慮，再加上疫情帶來的影響，動物處境更是不堪設想，中國湖南長沙就有民營動物園被員工踢爆在關閉期間讓動物餓死或凍死。」⁵但一段時間之後，眼見疫情似乎並沒有趨緩，關於動物如何受到波及的報導，也變得越來越少。

甚至，在低迷的氣氛中，媒體開始報導比較能吸睛與安撫人心的，與動物園有關的溫馨新聞，例如「喚醒花園鰻大作戰」這類報導：日本的墨田水族館因疫情暫時關閉後，其中的花園鰻久未見遊客，開始害怕人類，因此館方在推特上發起讓花園鰻與民眾「視訊」對話的活動，以便讓牠們重新習慣人類的存在，噱頭十足的「花園鰻視訊會」活動獲得熱烈的響應，媒體也不吝披露這樣的「好消息」。⁶觀眾有這樣的心理需求、媒體有這樣的報導偏好，都不難理解，因為這或許才是人們想聽的「故事」。但這類的故事不應讓我們（選擇性）遺忘其他關於動物死亡的事件：2020年11月，丹麥在水貂養殖場發現了一種可傳染給人類的變異新冠病毒，決定撲殺超過1,000個養殖場的水貂，但在相關報導中，只見撲殺被當成一項「非常大的工程」，⁷1,700萬隻水貂本身不曾是「哀悼」的對象。水貂如此，被視為新冠疫情源頭的蝙蝠自然也難逃厄運，例如「印度北方的拉賈斯坦邦，當地村民迷信住家附近看到蝙蝠不吉利，加上懼怕新冠病毒散播，有上百隻果蝠集體遭村民撲殺」。⁸在疫情影響下，動物的災難不斷在發生，但全球死亡人數也依然繼續增加，這樣的時刻，動物的死亡要成為引發哀悼的「故事」極為困難。因為多數人的反應難免是，眼前人的問題都處理不完了，何能顧及動物？

然而人與動物的命運從來就不是能夠斷然切割開來的，疫情本身也正在告訴我們這件事：「回顧以往新興傳染病爆發歷程，多是人類行徑對環境造成衝擊，埋下惡根。濫墾山林、濫捕濫食、人口過度稠密集中，拉近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距離，最後自食惡果，導致疾病跨物種傳播……人類與所有物種共存於地球上，沒有健全的生態系統，人類也無法健康生存，過去傳染病的發生就是最

⁵ 引自黃宗潔：〈在（後？）疫情時代思考動物園〉，該文將收錄於與黃宗慧對寫之動物書，預計2021下半年由麥田出版。

⁶ 同註5。引自黃宗慧：〈（水族）動物不是奇觀：從「花園鰻視訊會」談起〉。

⁷ BBC中文網（2020年11月5日）。〈新冠疫情：丹麥發現變異病毒可能致疫苗失效，上千萬養殖水貂遭撲殺〉，<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54820998>

⁸ 《天下雜誌》（2020年6月15日）。〈一封信「蝙蝠學者請幫忙」，揭露全球傳染病元兇是人類〉，<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0704>

好例證，若持續忽視，未來如同新冠肺炎的疫情，只會一再重演。」⁹也因此，儘管我們或許覺得，此刻要談為動物哀悼未免陳義過高，但在唯有「人、動物、環境健康一體」(One Health)才能共活的年代，我們非但需要認知到哀悼動物的重要，甚至需要懂得「共哀」(grieve with)。

「與動物共哀」這個同樣由范道倫所提出的概念，比起單純地哀悼動物更基進之處，在於肯定了動物也有哀悼的能力。范道倫發現，長期以來對動物哀悼能力的否定，是一種人類例外主義 (human exceptionalism)，而只要我們繼續認定只有人類有哀悼的能力，不覺得動物是可以和人類相提並論的生命個體，為牠們感到哀傷的可能性就會降低。也因此，即使科學界對於動物是否有哀悼能力仍有諸多爭議，范道倫仍強調，至少鳥類與部分哺乳類動物具有哀悼的能力 (Dooren 2014: 126, 140-41)。對他來說，懂得共哀，才能打開共活的契機。范道倫並指出，當動物出現類似人類哀悼的反應，甚至像葬禮這樣的儀式時，科學家總傾向用其他的方式加以解釋，因為我們覺得只有人類才可能有如此複雜的情感與儀式，正是這種人類例外主義阻撓了我們去哀悼動物。就以烏鴉這種和伴侶關係緊密的動物來說，華盛頓大學野生動物科學系教授馬茲盧夫 (John Marzluff) 表示，美國烏鴉若是發現死亡的同類，確實會紛紛飛過來圍在死去的烏鴉旁，發出很大的叫聲，群聚一陣子之後才飛走，但在他眼中，一般雖據此以為烏鴉有所謂的葬禮，其實牠們只是在試著了解這個非常危險的情境：這裡可能是個危險的地點，或有危險的獵食者，又或者有其他牠們需要知道、才能在未來避開的情境；換句話說，牠們是在蒐集必要的情報。加上美國烏鴉可能長達兩年都不會再靠近曾有同類死亡的地區，甚至會改變整個飛行的路徑以避免飛到出事的地方上空，這似乎更坐實了本能論——是避開死亡的這種本能，而不是哀傷的情緒，讓烏鴉群聚在死亡的同類附近 (Dooren 2014: 138-39)。對於這樣「功能性」傾向的解釋，范道倫並不直接反駁，而是也跟著從演化的觀點來討論：他認為對群居動物來說，共感 (empathy) 有益內部團結，所以對個體的生存也是有利的，本來就很可能在演化過程中發展出來，而哀傷，則是隨之出現的代價。范道倫把哀傷稱之為「全心投入的代價」(cost of commitment)——因為投入了這個群體，因為共同生活且有情感的連結，所以分開的時候就會感到哀傷 (Dooren 2014: 134-35)。從這個角度來看，群居動物如烏鴉，會從共感演化出哀悼行為，並不足為怪。

雖然從演化的觀點來解釋哀悼情感的出現，可以言之成理，但范道倫更好奇的是，為什麼長期以來人類好像非把動物的哀悼行為解釋成功能性的不可？

⁹ 同註 8。

例如在前述美國烏鴉的例子裡，會把飛近死亡同類的行為解釋為學習避險，而不太願意承認動物的情感。顯然，這還是人類例外主義作祟。當然，范道倫並不是要否認烏鴉試圖從死亡中學習的這個面向，但他認為，這個事實並不足以否定，牠們同時也能感覺悲傷，因為學習和哀傷並不需要互斥，甚至，恐懼或是哀傷這種強烈的情感反應，會更強化學習的效果：正因為哀傷，所以需要重新學習、適應失落帶來的改變。正因為哀傷，所以會牢牢記住（Dooren 2014: 138-39）。范道倫並問，就算科學家的推論無誤，烏鴉只是試著從其他同伴的死亡中學習，不能斷定為哀傷的表現，那麼人類不是更該想想，烏鴉看到一隻死了的同伴都知道要做出改變，以避開類似的危險，為何人類看到那麼多動物已面臨整個物種的滅絕，卻似乎一點也不覺得需要尋找新的生活模式，來面對這個脆弱的、改變中的世界（142）？

問題或許就出在我們還沒能開始「共哀」。我們否認動物也有悲傷和失落這種情緒，如此，才不會感覺需要為物種的消失或滅絕背負更多的責任。但是如果人類持續不去正視，我們和消失的他者之間有著怎樣複雜多樣的連結與相關性，且共享著唯一的、共同的世界，那麼現況只會往更壞的方向發展。范道倫因此主張透過「故事化的悼念」(storied-mourning)——或換成哈洛威的話來說，就是為死者代言——來造成一些改變。簡單來說，面對這個苦難、失落與滅絕仍在攀升的世界，述說值得哀悼的故事、讓哀悼使我們能持續地記憶、讓我們被這些死亡陰影纏繞，才能避免一再重蹈覆轍（142-43）。如果疫病的經驗一直在告訴我們，作為命運共同體，我們不該再用人類例外主義那一套原則，認定動物的生死不足為道，那麼，或許除了哀悼被疫情奪去生命的人類，我們也應該開始思考，疫情下死亡的動物，是否亦有待死者代言人，來述說關於牠們的哀傷故事。

參考文獻

- 西蒙·路易斯 (Simon L. Lewis) 與馬克·馬斯林 (Mark A. Maslin) 著，魏嘉儀譯 (2019)。《人類世的誕生》(*The Human Planet: How We Created the Anthropocene*)，臺北：積木文化。
- Haraway, Donna.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P.
- Dooren, Thom van. (2014). *Flight Ways: Life and Loss at the Edge of Extin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P.
- (2015). The Last Snail: Loss, Hope, and Care for the Future. *Land & Animal & Nonanimal*, edited by Anna-Sophie Springer & Etienne Turpin. Berlin: K. Verlag and Haus der Kulturender Welt, pp. 1-14.
- (2018). Temporal Promiscuities in the Chthulucene: A Reflection on Donna Haraway's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8(1): 91-93.
- Dooren, Thom van, & Deborah Bird Rose. (2017). Keeping Faith with the Dead: Mourning and De-extinction. *Australian Zoologist*, 38(3): 375-378.